「獨一代」養老困境

行李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推行計劃生育政策，有了第一代獨生子女，簡稱「獨一代」。如今，「獨一代」逐漸步入「而立之年」，要獨力承擔贍養之責，由此帶來「獨一代」養老難的社會困境。

過去，父母贍養有兄弟姐妹輪番接力，現在，「獨一代」能指望誰？兩個獨生子女結婚生子後，上有四老，下有一小，除了時間、精力上顧不過來外，經濟壓力大也是重要因素。面對「收入低、物價高、房價高」現狀，許多「獨一代」既要供樓，又要育兒，還要日常開銷，每月下來，工資所剩無幾。

「獨一代」最怕父母生病。上海「獨一代」白領徐某爲照顧快失明的父親不敢生子。南京「獨一代」王鳴動用預留購置新房的二十萬元首付，給沒有醫療保險的母親支付高昂藥費。今年二十九歲的「獨子」徐超爲照顧腦血栓的母親累哭了。

近日，內地一家媒體針對「獨一代」作的調查顯示，高達九成的八十後無法贍養父母，有一半以上還需父母資助。儘管如此，有七成老人卻表示，他們不願靠兒女養老，「寧可孩子啃老，也不願自己啃小」。

許多「獨一代」成家立室後，因爲追求自由、異地工作、住房壓力大等緣故搬離父母，越來越多老人獨守「空巢」，缺乏日常照料及精神慰藉。很多以往只願居家養老的老人開始轉變觀念，嘗試各種養老方式，如異地養老，社區養老，住進老年公寓。

但現在的養老院也是「一床難求」，各地養老院紛紛「爆滿」。在北京，每百名老人中僅有兩人能住進養老院；在南京，有老人爲盼一張床位等了三年。據統計，截至二〇〇九年底，中國六十歲及以上的老人已達一點六七億，部分失能老人約爲一千八百九十四萬。但是，中國養老床位供應只有二百六十六點二萬張，至少空缺三百萬張。此外，各類養老機構人手嚴重不足。以南京市爲例，全市養老機構總床位二萬三千七百一十七張，工作人員只有三千二百零一人，平均下來，一個護理員要照顧八位老人。爲解決「獨一代」養老困境，內地各市努力探索各種養老模式：成都試水「家門口養老」，耗資千萬在各社區內建養老服務站，子女與老人相隔「一碗湯」的距離，子女從家裡端湯到養老服務站給老人喝也不會涼；重慶試開「託老所」，工作人員早上會將一些「空巢老人」接到託管中心吃飯、休閒、玩樂等，子女下班後會將老人接回家，共聚天倫之樂。但目前中國「社會養老」服務體系仍遠遠滯後。

專家指出，「養兒防老」不如「養一套公共服務體系防老」，政府應給予更多關注並發動社會各界介入。如，烏魯木齊市政府大力支持民資辦養老院，最高補助三萬元；浙江溫嶺市邱家岸村推出「一元房」政策，村集體出資建設了一百多套老人公寓，入住一天只要一元錢。歸根到底，內地「獨一代」養老困境絕非「獨一代」能夠獨力解決完成的。

鄭定文似流星閃過

許定銘

鄭定文（一九二三至一九四五）一九四四年在上海《萬象》月刊上發表短篇小說《大姊》和《魘》後頗受重視，其後他陸續發表了多篇小說，成爲文壇上的新星，被視爲最有前途的新人，可惜大家還未認清他的臉目，鄭定文已於一九四五年中遇溺，似劃過長空的流星殞落了。

鄭定文逝世後，他的好友魏尚均整理他發表過的作品《小學教師》、《小職員日記》、《考試的故事》、《被擯棄的》、《凍死的人》……等十二篇，並寫了附錄《記達君》（鄭定文原名蔡達君），交給並不認識的巴金。巴金讀後，覺得鄭定文這些小說「貫串着似淡而實深的哀愁」，感人甚深，便把它們定名《大姊》（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四八）作爲《文學叢刊》之一出版了。如今大家所見的，則是台北成文出版社於一九八〇年出版的重印本。

鄭定文是浙江寧波人，一九四二年畢業於上海麥倫中學，因家境貧窮無法升學，只好留校當庶務員謀生。他熱愛文學，工餘寫文章抒發內心的鬱悶，他的小說擅寫低下層市民的生活，代表作《大姊》和《魘》以他的家人和生活在同一條陋巷的鄰人爲題材，這裡有刻苦而無法謀生的貧民，有出賣靈魂的「人牛」，有吸鴉片自甘墮落的貧病青年……是上海貧民窟的寫照。

鄭定文著《大姊》

「吃了嗎？」及其他

段懷清

以前念英文，老師在講到中西文化習俗之差異時，大多好以中國人的見面語爲例。其中列舉最多者，當屬國人見面時習慣的一句招呼語「吃了嗎？」。老師的意思是，這樣的招呼語，倘若直接翻譯成英文，不免讓外人疑惑：中國人見面時怎麼老問「吃了嗎」？難道他們準備請客嗎？中國人的好客，由此似亦見一斑。於是，老師建議，這句「招呼語」，不能夠直接翻譯成英文，而應該意譯，大抵相當於英文裡的「你好！」之類的問候語。

前段時間讀《朱自清全集》，其中有一篇「論意義」的文章，談到的話題，與上面「吃了嗎？」一類的話題頗爲接近，不妨摘錄如下：就拿日常的應酬話來看：比方你進小館兒吃飯，看見座上有一個認識的人，你向他點一個頭說：「來吃飯？」他也回點一個頭，回答一聲「唉，唉」。於是彼此各自吃飯了事，他明明是來吃飯，還要問豈不是廢話？可是這種廢話得說，假使要表示好感的話。對於一個認識的人，有時候只要點點頭就成，有時候還得說一兩句廢話。這種廢話並無意思，只不過表示相當的好感就是了。例如「來吃飯？」這句問話，並不是爲的要知道那人是不是來吃飯，而只是理他一下。

也就是說，在朱自清看來，中國人見面時候的「吃了嗎？」或者「來吃飯？」之類的招呼語，不過是些有用的「廢話」而已——它並非全無意義，只不過其意義並非是字面上的，而僅表達一種熟人之間的「好感」與「情緒」而已。換言之，這種招呼語或問候語，在語義上是「言在此而意在彼」，其實就連這裡的「意」，也不過是一種幾乎可以等同於見面時候的一個笑臉甚至「點點頭」而已。所不同者，這種招呼，畢竟還開了口。

所以，實際上國人的見面招呼語「吃了嗎？」並不能簡單理解成實際上詢問你「吃了嗎？」（或許部分時候，這種招呼語中確實包含有詢問是否吃過了的意思），它本身就等同於一種表示熟悉、應酬的意思。

這不免讓人聯想到英文裡的類似語言現象。譬如英文裡的「今天天氣很好」之類。事實上，兩個英國人見面時候的這類「招呼」，實際上並無意就今天的天氣展開一番氣象學意義上的探討，不過是向彼此打過招呼而已。其意思，跟後來口語中更簡化的「你好！」之類爲近親。

如此看來，如果你想將中國人見面時候的招呼語「吃了嗎？」，翻譯成英文裡的「今天天氣很好」，實在算得上一種「妙譯」——兩種招呼語之間原本存在着的文化差異，一下子就擺平了。或許「是否吃飯」曾經是國人尤爲關心的一件大事，而對於素有霧都之稱的倫敦來說，見了面說說「天氣很好」一類的輕鬆話，自然讓人聽了是一種愉快——誰願意在霧氣纏繞的城市裡壓抑地生活呢？

由此看來，所謂「吃了嗎？」「今天天氣很好」之類的招呼，本來就有兩重意義。其本意實在不需要過於關注，倒是其字面後面的「意思」——表示熟悉、好感之類，中西文化竟有異曲同工之妙，明白了這一點，其實生活中有些「無意思的廢話」，還是得說下去。

死神也要談戀愛

李維國

一九九八年戴上諾貝爾文學獎桂冠的葡萄牙首席作家薩拉馬戈已於今年六月去世。他去年十月底才到巴西聖保羅市，出席名爲「夢的稠度」（Consistency of the Dreams）的個人創作特展；特展四月在薩拉馬戈家鄉葡萄牙首都里斯本首展。稍早他和巴西導演佛南度・梅瑞爾斯（Fernando Meirelles）相見歡。梅瑞爾斯將薩拉馬戈一九九五年的名著《盲目》（Blindness）改編電影《盲流感》，獲選爲去年坎城影展開幕片。

行程滿檔，但像是爲破除「諾貝爾文學獎是死吻」的創作魔咒，薩拉馬戈桂冠加冕十年間創作不輟，新著頻出，而且總是顛覆老套，融會古典的哲學憂思與諧謔的現代情境，讓評論家嘆服。他去年八月才用母語交出新書《象之旅》（The Elephant's Journey），藉印度象的眞實遊歷，凸顯人類的愚昧，在葡萄牙書店風靡一時。他二〇〇五年的長篇小說《死神放長假》（Death with Interruptions），英譯本去年也相繼在大西洋兩岸書市亮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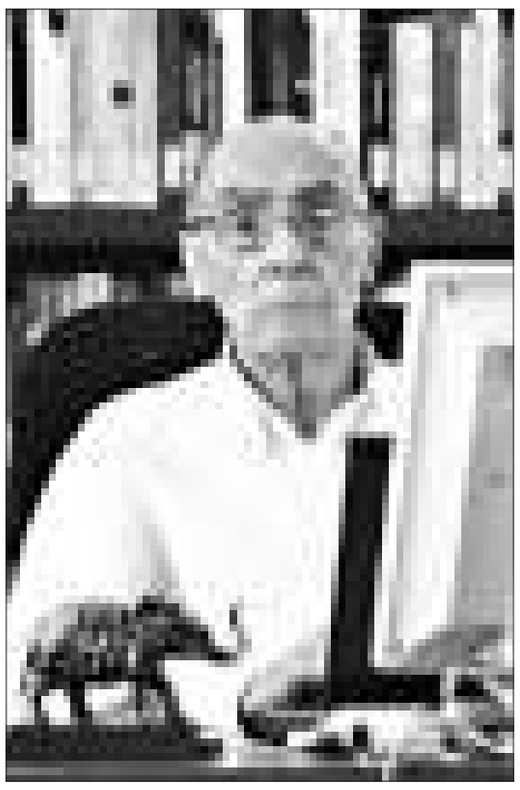
薩拉馬戈六十多年的寫作生涯十分傳奇，他二十五歲提筆，但中斷多年，靠當黑手、老師、記者營生；五十多歲開始專心寫小說，六十歲以《巴達薩與布莉穆妲》（Baltasar and Blimunda）名聲大噪。他作品類型多樣，詩、戲劇、回憶錄、遊記各有可觀，但小說成就最爲人稱道。《詩人雷伊斯逝世那年》（A Year in the Death of Ricardo Reis）及《耶穌基督的福音》（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esus Christ）透露他是無神論者、信仰共產主義，《未知島傳奇》（The Tale of the Unknown Island）及《所有的名字》（All the Names）傳達他對仇外情緒和麻木官僚的不屑。

靈感像得自柏拉圖的《洞穴》（The Cave）中，工匠創作受限政府桎梏，最後反擊；《盲目》他想說的是：「盲目並非眞的瞎，是對理性的盲目。」眼盲如黑死病蔓延造成混亂。在薩拉馬戈眼中，民主需要新生，因爲經濟力量決定政治力量，「我對民主存疑；人民四年才投一票，其間政府爲所欲爲」。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令他深受感動：「眞是美好的一刻，不投票的選民因新的候選人動員，還是個黑人，那是一種革命。」

書迷會發現，《死神放長假》像是翻版《盲目》的骨幹：在某不知名國度，新年伊始，人民就莫名所以不再死亡。民衆先是歡慶得到永生，很快就認清現實逼人：少去死亡清理病痛，只剩無盡的磨難。他們得無休無止照料死不掉的親人，醫院運轉一團糟、保險變成廢物、殯葬業只能埋葬動物；社會亂象頻傳：重病者湧入鄰國「找死」，黑幫偷渡人口大發利市。政客和宗教領袖陷入恐慌，經濟學家提出「終生殘疾年金」，教會「發動全國祈禱活動，祈求上帝早日恢復死亡」。

混亂中電視台收到一封署名「死神」的來信，解釋她實驗失敗，當晚將重新開工，只是做法改變：她會在死亡日七天前寄信預告。衆人狂歡，但死神寄給一位中年大提琴家的信被退回，她親自送信卻陷入情網……雖然死神也要談戀愛，但薩拉馬戈不認爲這是本羅曼史，「我想寫的是所有不可能的可能性，原初的想法或許荒謬，但重要的是後續發展總是理性合乎邏輯。」

薩拉馬戈二〇〇七年冬天因呼吸道疾病送急診，「情況太糟，醫院拒收」。他笑說：「他們不想成爲薩拉馬戈死在那裡的醫院。」出院後他仍然忙個不停，參加《盲流感》的里斯本首映會，還成立基金會，「替葡萄牙文化生活帶來新動能」。


葡萄牙作家薩拉馬戈（歐新社資料照片）

今年要出版回憶錄《記憶拾零》（Small Memories），薩拉馬戈對新書《象之旅》津津樂道：「象的旅程是生命的隱喻，我們都知道最終會死，但不知道是怎樣的結局。」當初寫沒四十頁就住院，出院後立刻提筆，「我沒想到書中充滿幽默，逗人發笑，沒人猜得到我當時的處境」。

（台灣《聯合報》供稿）

見證 （攝影）亨戈

金陵女兒之三・陳懿貞

馮進

上個月我意外地收到台北「中華民國筆會」的伊妹兒，說是因爲要重新出版陳懿貞女士的翻譯作品，希望我能提供她最新的聯繫方式。和陳懿貞相識，是因爲我曾採訪金陵女子大學在美國的多位校友。她在電話中多次耐心細緻地回答我的各種問題，二〇〇六年在紐約第一次見面一起吃飯時，她同樣溫文善意，讓我再次領略了金女大校友的風範。所以，收到來自台灣的這個伊妹兒，我馬上給她打電話，徵求她的同意。

可是打了好幾次，都有自動回覆說該號碼已取消。我又給居住在加州的金女大美國校友會主席打電話，希望能獲取陳懿貞的最新聯繫信息，可是也沒人接聽。直到我和另一位金女大校友潘韌秋通話之後，才得知陳懿貞已經在去年過世了。雖說這也算高壽多福者的「喜喪」，可我還是不免興起「故人恰似中庭樹，一日秋風一日疏」的感慨，同時也回憶起她的人生往事。陳懿貞的父親曾經留美，回國後擔任牧師，她從小上教會小學和中學，又於一九四一年畢業於金女大英文系。她的最後幾年大學生活是在成都校區度過的，因爲金女大於南京陷落前疏散，在一九三八年搬到華西壩，直到抗戰勝利後的一九四六年才回到南京校區「復員」上課。聽她的回憶，戰時成都的學生生活也別有滋味。

首先當然是她們這些「外來戶」得和當地學生、當地人打交道，她們曾經坐滑竿上山，從附近的果園買桃子。那時華西壩在城外，幾個同學也常結伴步行進城看電影、逛商店。「那時沿路有很多茶館，我們走累了就坐下喝茶吃點心。」她記得看到很多穿着長袍馬褂的當地人在茶館談生意，「在長袖管裡討價還價」。某年寒假，有位同學還邀請一位美籍華人體育老師和她們幾個同學去西康家中遊玩，她們見到了大雪山、小雪山等特別的自然景觀，印象深刻。陳懿貞於一九四三年來美國留學，在名校史密斯（Smith）女子大學學習英文。她對美國女生的社交才華非常敬佩。

當初每個女生宿舍都有一位「母親」（housemother）管理，每天晚飯後半小時是「法定社交時刻」（socialtime）。這位舍監請大家在起居室喝咖啡，學生們有的彈鋼琴娛樂大家，其餘人輪流坐到舍監身旁，和她閒聊一會兒再離開。「在中國，可沒有學生能和老師那麼平等、隨意、自然地交流。」問她在美國上學時吃些什麼？她說史密斯大學的羊肉讓她無法忍受，每次餐廳供應這個菜她都寧願吃麵包加花生醬。城裡的中餐館也讓她失望。

某次去一家粵菜館，老闆見她是中國人格外討好，在炒麵上多給了不少「澆頭」。「可我想吃的是米飯。他們只有『雜碎』和麵條，那些澆頭的湯汁就是美國人吃的白色肉湯，根本不像中國菜！」令我至今難忘的，除了陳懿貞回憶的這些學生時代的趣聞逸事，還有她對於他人的體貼、對於母校金女大的忠誠。某次我提到閱讀當年成都校區的宿舍規則和舍監記錄，說起那時有學生盜竊他人財物的現象。

陳懿貞一下陷入沉默，然後告訴我她不想討論這個問題，因爲「當年的當事人大家都認識，再說這些舊事有傷體面。」故人已逝，此情長存。能夠結識潘韌秋、黃麗明、陳懿貞這些金女大的校友，從她們這些年過耄耋的長者那裡了解歷史往事、學習人生閱歷、體會她們的人格魅力和智慧，這不但是學術界的福祉，也將會是我一生的寶貴精神財富。

知識分子

朱輝

我常想，「知識分子」這個詞恐怕以後很少會被提及了，因爲它變得越來越難定義了。

其實「知識分子」一詞誕生於建國之初。上世紀八十年代知識分子最吃香，當時某省報紙就進行過一場有趣的討論：「作家算不算知識分子？」最後似乎要等着上級出台有關文件才能定奪。

按照字面上的意思，古代知識分子絕大多數是文人，然而民國以後，數理化地位飆升，文人居然淪落到需要「論證」才能成爲知識分子的地步。不過在民間，由於歷史積澱深，說起知識分子，人們腦海裡通常會浮現出身邊某個小文人的形象。譬如我，印象中最具知識分子形狀的，便是初中時的語文老師楊老師。楊老師穿衣很有特點，那就是最上面那顆扣子都要扣得緊緊的。這點對我影響很深，至今我都經常被別人提醒：「上面那顆扣子還是解開吧，看着挺憋氣的。」

楊老師不僅穿衣嚴謹，表情也總是很嚴謹。他的口頭禪是「是嗎？」，配合不同的表情可以適用於任何語境。配以微笑，說明他正在傾聽你說的話；配以訝異的神態，表示 surprise；「是嗎？」配以稍稍拉長的尾音，代表懷疑……

楊老師的座右銘是孟子的一段話：「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他十六歲時因爲家庭出身不好，被發配內蒙邊境放羊。若干年後落實政策回城，進肉聯廠當了屠宰工。之後發憤讀書，考上大學，年近三十終於成爲了重點中學老師，獲得了「知識分子」的地位。他之所以能歷經風雨，熬成知識分子，都是聖人情結在支撐着。潛意識裡，中國知識分子大多做過「聖人白日夢」。

作爲知識分子，常常是孤獨而痛苦的。楊老師平日不喜歡與校領導交往，因爲骨子裡蔑視權貴。同時他又看不起工人農民小市民，覺得他們沒素質，身上充滿了毛病。由於班上同學大多出自高知家庭，我知道這種對於底層百姓骨子裡的鄙視，在知識分子中並不鮮見。他們何以有這樣的優越感呢？或許因爲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前，知識一直具有一定壟斷性，底層百姓沒有機會獲得足夠的知識信息。這種情況下，知識分子與白丁之間涇渭分明。而如今，高等教育普及化，互聯網通達鄉村小鎮，知識信息已經和醬油、醋一樣，成爲了大多數人的日用品。現在教授不一定比草根研究者學問大，專家不一定比小市民見識高，誰是知識分子？我看很難界定了。

不僅內涵，外觀上知識分子也漸漸混同於一般群衆。高校老師和生意人一樣，可以在酒桌上一口一杯；「偷菜」的人群中，有藍領工人也有外企白領。文革靠強制力改造「臭老九」，並沒有拉近他們與工農之間的心理距離。如今，當知識不再僅僅屬於某些「分子」，知識分子也就在潛移默化中融入了大衆之中。星期天我去本地最熱鬧的步行街走了一圈，沒有看到一個扣緊最上面那顆上衣鈕扣的人。

勿被金牌迷住眼

延靜

廣州第十六屆亞運會期間，我幾乎每天坐在電視機前看比賽。我癡迷體育比賽由來已久。記得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第二十六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在北京舉行，那時還沒有電視，也買不到票到現場看，就抱着半導體收音機聽廣播。當時的解說員是張之，說得活靈活現，也很過癮。當中國運動員打敗乒壇長期霸主日本隊獲得男團世界冠軍時，我一個人在屋裡禁不住鼓起掌來。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女排一次在捷克參加比賽，當時雖已有電視實況轉播，但因時差關係是在夜裡，儘管如此，我還是上上鬧鐘，半夜起來看了實況，鬧得一家人不得安寧。

多年觀看比賽，慢慢也悟出一些道理。過去看比賽，主要是爲了看中國隊贏球，從而振奮精神。這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中國曾被人視爲「東亞病夫」，新中國成立後才摘掉這頂帽子。中國參加國際比賽打敗對手，確實能振奮國人的士氣。但僅只期盼贏球，也會招致片面性，一旦看到中國隊在比賽中輸給對手，就會情緒不振，垂頭喪氣。其實看球和打球一樣，要贏得起，也要輸得起。對手球打得精彩，我們同樣也要爲其鼓掌喝彩；對手的拚搏精神，我們同樣應該讚賞學習。對於中國隊的失敗，也要進行分析，千萬不要一味地批評、埋怨，甚至謾罵。有的球隊和個人，平時訓練很刻苦，比賽時也打得很投入，很有氣勢，只是因爲對手太強而失敗，對於這樣的球隊和個人，我們不要過於苛求，世界上沒有常勝將軍，只能鼓勵他們繼續努力，提高技藝，爭取將來打敗對手。至於個別球隊場上表現很差，毫無鬥志，屢戰屢敗，丟了「人格」「國格」，我們就不能客氣了，要提出批評，嚴格要求。

一支球隊或個人，不可能長期處於顛峰期，有起有落當屬正常。譬如中國女排，曾有過一段黃金期，獲得五連冠，其後成績下滑，雖曾拿過一次奧運會冠軍，但總的來講是走下坡路，最近參加在日本舉行的世界女排錦標賽，竟下滑到第十名。中國女排失利，國人心裡當然不快，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勝敗也是兵家常事。曾多次獲得世界冠軍的古巴女排不是也滑落到世界第十二名嗎？只要我們認眞總結經驗教訓，女排還會東山再起。對於劉翔這樣曾經創造過世界記錄的運動員，希望他再創佳績可以理解，但也不要過分要求他。劉翔經過傷病和手術，現在又出現在賽場上，而且保持相當高的水平，已很不容易。奉勸人們愛護他，不要再給他加壓。

對於金牌，我們要既看重，又不要看重。金牌多，固然是國家體育水平的提高和國力強盛的表現，但唯金牌論也是不可取的。中國在北京奧運會上獲得金牌第一，在多屆亞運會上也屢得金牌第一，但是不是就可以說中國是世界體育強國呢？我看不是。如果再深一步想，是不是就可以說中國人民的健康水平屬於世界一流呢？我看也不是。與一些國家相比，就健康水平而言，中國在很多方面還不如人家。據報道中國青年學生的健康水平，不是在提高而是在下降。中國離體育強國還差得很遠，離全民健康水平上一個新台階，也還要走很長的路，切不可被金牌第一迷住眼睛。